

清季藏書四大家考(三) 高禔熹

第四章 錢塘丁氏嘉惠堂

一、傳略

錢塘丁氏嘉惠堂主人丁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號松存，浙江錢塘（今浙江省杭州）人。生於道光十二年，卒於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西元一八三二——九九），享年六十八。兄丁申，字竹舟，兩人自為諸生之時，即有「雙丁」之目。

父英，字洛普，候選同知加道銜。道光二十九年，浙西發生水災，洛普施粥救濟饑民，巡撫吳文鎔（字甄甫，儀徵人，嘉慶進士）曾題「任郎可風」四字匾額，表揚其樂善好施之義行。

丁丙自少穎悟，初入學塾，即獲塾師奇賞，嘉許其日後必有所成。咸豐四年，丁氏年二十三，入杭州府學，適遇太平軍占據金陵（今南京），江浙一帶，民心惶惶，一片混亂。丁氏隨侍父母，避居杭州附近之新城（今新登縣），不久，父染疾，母姚恭人亦病。丁氏事親至孝，親侍湯藥，並剖臂肉為羹，進奉雙親，冀能早癒，未幾，母病果癒，而父竟至不起。二年後，母又病，再剖臂，則未能奏效。丁氏連遭大故，哀感行路，嘉興張子祥曾為繪「風木齋圖」以紀哀思。

咸豐十年二月，太平軍進犯杭州。杭城舊有上下之分，丁氏兄弟，糾集下城之錫箔工匠共千餘人，協助守城，終以勢力單薄，為亂賊擊破。城陷後，仍拼死抵抗，與亂兵巷戰多時，故所遭焚掠稍輕於上城，即賴於箔工戰守之力。

杭城淪陷後，丁氏兄弟避亂轉徙於松江、青浦、南匯、上海等地。當時江蘇難民羣集於松江一地，丁丙乃召集諸善士紳，合出資財，施給粥糜及藥物，以賑濟難民，使不失其所。後以軍事失利，松江亦相繼失陷，丁申率領親眷先行避難，丁丙則以須料理救災事宜，未得同行，竟與亂軍相遇。亂軍連續三發火槍，皆未命中；又騎馬追擊，馬又蹶地，未能追及；丁氏乃倖免於難，似有神冥冥中護佑，或即為平日積德之善報。

次年，丙又回杭州，創設崇義祠，纂輯崇義錄，表彰杭城拒賊死難諸烈士之壯烈事蹟。賊軍攻城時，往往盜取撤厝之柩，以構築工事，丁丙乃與舅氏陸君設立學局，購置墓地，供給學中死而無力埋葬之貧民。然時局日亟，江蘇各地皆已淪陷，杭州情勢益形孤立，賊軍進逼日甚，加以城內糧食亦無以為繼，終告失守。

杭州再度棄守，丁氏乃渡江前往蕭山，此時渡江難民多如過江之鯽，舟夫趁機敲詐，任意索價，如不鑿其勒索，則立即投於大江，因之江邊哭號之聲，響徹雲霄。幸丁丙代為出資，難民始能安然渡江出險。

出城逃難之際，丙與兄申兩相失散，行至陶堰，發現丁申壁間之題字，始知其尚在留下鎮（杭州西北之小鎮），乃前往相聚。

同治元年，丙在留下避亂，發現市中商販賣物，多以字紙包裹；取而視之，則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文瀾四庫為乾隆五十餘年續鈔四庫全書，頒發江南三部之一，貯於杭州聖因寺內。今既親其書散棄，始知文瀾閣已毀於兵火，中心惘然，乃召集壯夫數人，趁夜檢拾，冒險潛運，不辭勞瘁，每夕往返數十里，捫捨所得，則暫置於其父殯宮之中。丁氏蒐輯文瀾閣遺書，即始於此時。

尋以敵氛益熾，浙西難以安身，乃於三月間，自紹興至定海，又轉上海至如皋，倉皇奔逃，復不憚煩難，携書同行。於渡海時，曾遇賊兵盤詰，因見書上朱墨累累，知為官家之物，虎視鷹騰，舉白刃相向。同舟者咸心惶目眩，幸經丁氏從容剖辯，始能化險為夷。殘喘稍舒，即手編書目，猶感不足，乃托書賈周潤西趕回杭負土之便，間道至杭州訪求書籍，寬得殘書，束以巨絙，各束高三尺許，計有八百束。於同治二年四月，經蕭山、紹興、寧波、運至滬上。丁氏篤信佛教，又自滬上至普陀禮拜觀世音，衆僧人誦佛號，並以明處士崔子忠所畫應真十五尊，施予惠濟寺，以冀能消除劫運，使存者亡者皆能得以安樂。

同治三年，杭城收復，丙即乘舟載書，自滬歸杭，浙江巡撫左宗棠，見其不顧身家性命，護持邦國文獻，為之肅然動容，又素知其見義勇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故即召見，委以籌畫地方善後復建重任。

左宗棠在薦人才奏摺中云：「杭州府學生員丁丙，見義勇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在杭州設振撫局，辦理各務，巨細咸宜，人皆稱其善而服其敏」。在該年十二月，奉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六年二月又敘功賞加同知銜，江蘇大吏，皆敦勸其出山，然丁氏皆謙辭不受，孫德祖松生丁先生別傳云：「省會當大兵之後，所以善其後者，修舉廢除，唱建非常，控惚旁午，無巨細必屬于先生。厥後持使節撫浙者，類無勿

引先生爲重，有庶政輒賴以辦事」。

丁氏畢生心力悉萃於杭州之建設，袁昶曾將丁氏在國難期間在鄉里所爲善行，擇其犖犖大者二十八件，撰成「丁徵君善舉廿八事碑」，以表崇敬之忱。其文云：「杭州丁松生徵君被服仁義，苞孕善聲有日矣。友人自杭來者，輒述徵君好善不倦，老而彌篤，備錄徵君在杭所爲善舉犖犖大者廿八事」（全文可參宜堂類編卷廿二，善舉記）。總其大要，約有二端：即存文獻，與籌教養。

在存文獻方面：

丁氏不顧生命安危，於灰燼瓦礫之中，檢拾文瀾閣庫書。亂定之後，文瀾閣雖能幸存，然已棟宇半圮，尙待修建，丁氏乃告語大吏，以杭州府學尊經閣爲暫儲之所，請海鹽陸弼弼繪「書庫抱殘圖」以紀其事，巡撫左宗棠並題字以張之。丁氏且自號爲「書庫抱殘生」，亦可見其欲矢志恢復文瀾閣舊觀之決心。

自同治五年至十三年，九年之間，丁氏兄弟悉力徵訪，四處搜購文瀾閣遺書，並益以嘉興徐葵之在滬上所蒐得五四九本，總計得三百餘種，計經部二六八本，史部八七五本，子部一、九三二本，集部五、一一四本，圖書集成六七三本，以及未分部目之一九八本，共爲九千零六十二冊，勉得四庫存書十之三、四。丁氏爲補拾遺缺，費盡苦心，時時留意選擇底本，可購者購之，所不能購者，則豫借錄附；一時不及遍借，則於簡明目錄下，以小楷詳註某省某鄉某某家藏刊本、某鈔本，或某局刻某藏書，以待日後商借鈔補。

光緒六年九月，浙江巡撫譚鍾麟（字雲觀，茶陵人，咸豐六年進士），採納丁氏建閣補書之建議，著手重建，於丁氏規畫，並監督工程進行。次年三月落成，是年秋，將所有前存府學四庫遺書萬餘本，恭事移歸，於是閣與書復合。巡撫譚氏疏陳其事，言丁氏兄弟於兵戈擾攘之際，能搜求遺書，購覓底本，俾後進得窺遺書，其見識迥越尋常，可謂篤行教本之士。因而獲旨褒獎其嘉惠士林，故人人數語，名聞當世。

光緒八年起，丁氏又肩負補鈔閣書，重整殘編之重任，盡出其家藏珍籍，集工逐寫，並乞助當時其他著名藏書家，借予藏書以便完成補書盛事。據王同撰文瀾閣補書記云：有「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盧氏之抱經樓、錢塘汪氏之振綺堂、孫氏之壽松堂、海寧蔣氏之別下齋、山陰沈氏之味經堂、慈谿馮氏之醉經閣、長沙袁氏之臥雪廬、常熟瞿氏之恬裕齋、宣城李氏之瞿礪石室、錢塘吳氏之清來堂、仁和朱氏之結一廬、湖州陸氏之菴宋樓、金華胡氏之退補齋、豐順丁氏之持靜齋、南海孔氏之三十三萬卷堂，凡他人捐架之書，一一按索，或翻以繅帛，或易以琉璃，或裝璜而往，或航海而歸，頻年借補」，其間往往歷盡諸多艱鉅，爲鈔得一書，必經十數轉手，方能告成，其辛苦若此。前後歷時七年，至光緒十四年止，共成書三千餘種，合原藏閣本遺缺三百三十一種，遂達三千三百九十六種，合計計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冊，實支費用約五萬一千六百緡。於是鈔補閣書之業，以底於成，唯差未得底本之數十種而已。其所鈔購之書，竟已逾原書十分之七以上，往往有提要所著缺卷之書，如經部魏了翁之「尚書要義」二十卷，注佚其三；許謙之「讀四書叢說」二十卷，注爲中庸佚其半，論語全佚；史伯璿之「四書管窺」八卷，注爲論語第十一篇以下，佚不可考。史部辛文房之「唐才子傳」，原本十卷，永樂大典因其散佚，釐爲八卷；徐乾學之「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一，注爲缺不可考。子部盧頤之「本草乘雅半偶」，原本十三卷，注佚其二。集部曹勳之「松隱文集」四十卷，注佚其一；朱佑之「白雲稿」，注爲十卷佚其半，皆得全本補足，以彌補前時缺憾。此外，閣中舊藏尚有古今圖書集成五千零二十冊，全唐文五百零四冊，亦於戰亂時散佚，其後丁氏亦一並配補，簡述如後：

一、古今圖書集成：杭州藏有殿本古今圖書集成要早於四庫。錢尚文瀾閣目卷五之四（古今圖書集成）云：杭州西湖之有圖書集成也，實先於文瀾閣之有四庫書……，咸豐兵災，舊藏散亂（原書今尙存一、二百冊，破碎不完），丁氏另購鮑氏家藏不完本以代之，鮑氏即士恭後人，其書即乾隆三十九年賜本（四庫徵文進呈多者，賜康熙年所印圖書集成、全唐文集），丁氏又用他本抄補四十二冊，勉成完書，今仍貯閣中。

二、全唐文：文瀾閣收藏全唐文，始於嘉慶二十四年，奉兩淮運司移到五十匣，計五百零四冊，此書經咸豐兵災散佚，丁氏重建文瀾閣時，將家藏重刊本一千卷送藏閣中。

三、剿平粵匪方略：太平軍亂平定後，清廷撰平定粵匪方略，於同治十一年八月告成，全書四百二十卷，光緒七年閣成，巡撫譚鍾麟請求頒額，並以各府縣志蕩然無存，雖經修補而文獻無徵，事蹟需考爲由，請頒方略一部，以供修志者參考。

四、閩省來珍版叢書：乾隆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印刷時增領行文又有去取，致各省傳刻不一，而以閩刻爲最多，然歲久頗漶漫，譚鍾麟自浙撫升爲閩浙總督，移節閩中，復加修補，凡一百四十三種一千冊，刊成後郵送全缺命藏閣中，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咨送浙撫，由丁氏具領。

此外，丁氏又盡力於修葺鄉黨古蹟，藉以宣揚先賢名節，俾使後世瞻仰，以敦厚民俗。如蘇祠、白祠、錢武肅（鏐）祠、岳忠武（飛）祠、于忠肅（謙）祠、林處士（和靖）祠、宋校尉施全祠、楊侯再興祠、徐巨翁志節祠、王項二公揚清祠、宋行人朱弁墓、胡公則龍井祠、陳忠肅（瓊）墓、張楊園（履祥）先生墓、郭孝童墓，及孫花翁墓等。其所需經費，或呈報官府撥款，或由個人捐輸，足爲其熱心桑梓建設之證。

又如修交蘆庵，以高適奚鐵生、戴文節各先生名蹟置其中。建玉照堂，並為補種梅花。獲得元成宗大德年間編錄，而建元音亭。獲得宋真宗咸平年間貝葉經文，而歸藏於雲林寺。獲得五代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即捐獻於靈隱、昭慶各寺，一時餉事，尤得鄉人樂道。

在籌款方面：

丁氏自受命後，即創設各項社會福利機構，以推進社會福利事業，如設立難民局、掩埋局、施材局、醫藥局、牛痘局、錢江義渡局、救生局等不下數十處之多。杭州原設有普濟堂，然以兵亂後未及復建，故光緒間，又創設同善堂，此後則兩堂並存，善舉益備，且能推廣其意，隨意設施。又以杭州多火災，而設郵災所；以多游惰之民，設運善所；因庚申之亂死難甚衆，而築義烈遺軒；以亂後民間子弟無力延師，而設正蒙義塾；以胥吏於命案多有需索，而置報驗所；以民間緩急無所資，而置借錢局；以民間節婦不能概至清節堂，而倡軀德遺集，以補所不及；以育嬰堂所雇乳媪有限，而分設接養所，以濟其窮。又於城之四隅設粥廠，使貧民冬日無枵腹之虞。設丐廠，收容行乞窮民，使無溝壑之患。

又在浙西興修水利設施，在城中開鑿新橫河，建築新水壩，在城外則浚北湖南湖，又修樂仁和海寧上河堤壩。並在西湖常年設置湖局。又設置義倉，於米貴時散賑平糶，濟助貧民尤多。杭城自收復後，土風振起，民力寬紓，可謂多賴丁氏之力而有所成。

丁氏天性篤厚，與兄申，白首無間，淡泊自處，視榮利如浮雲，平居唯以圖籍自娛。於貧困親族，無不盡力周濟，視羣從昆弟，皆如同出，誠為「敦本篤行」之士。六十五歲時患痰眩之疾，時劇時瘳，過二年，又患下痢之疾，於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九卒於家，享年六十八。丙有子三人，長名立中，字和甫，光緒十七年舉人；餘二子皆早寡。申有子名立誠，字修甫，光緒元年舉人，並知嗜書。

丁丙著述甚多，已刊者有北白齋錄、續錄各二卷，三塘漁唱三卷，續河東揮歌一卷，西冷四家印存一卷，師讀齋漢銅印存一卷，菊邊吟一卷，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庚辛泣杖錄十六卷；尚有讀禮私記、禮經集解、松夢寮詩初集，皆毀於兵火。九思居經說、說文部目詳考、說文家韻譜集注、廿四史刻本同異考、樂善錄、于忠肅公（諱）祠墓錄、武林金石志、皋亭山志、宜堂小記、松夢寮集、北郭詩集、西溪詩集等，皆藏於家。

丁氏重視桑梓文物，盡力搜羅鄉里前輩著述、整理地方掌故，俾後人徵考，刊刻先哲遺著，以表揚先哲功業，曾刻武林掌故彙編廿六集一八七種，武林往哲遺著五十種，吳退盦之國朝杭郡詩輯，與氏孫仲雲之續輯；丁氏並廣其未備，而編刊其三輯。子越所撰「二丁先生刊書表」，言之最詳。

二、遞藏源流

丁氏家書淵源亦久，始於其祖國典先生（字掌六），因慕其先世間人丁頌，曾有藏書八千卷，建大室以貯之，並有言曰：「吾家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遂於梅東里興築小樓，命名為八千卷樓，以紀祖德，並請樂山舟（同書）學士題額。

父英，字洛者，能讀祖書，且喜藏書，又嘗往來齊、楚、燕、趙之間，遇有秘籍，即購載而歸，悉力搜購，從無間斷，得數萬卷，多為乾、嘉諸老裏中秘藏，於是插架漸富。丁氏兄弟又能踵繼父祖之志，雪鈔風枝，益其不足，於是八千卷樓之名，聞名當世。

咸豐辛酉之亂，杭州先後兩度淪陷，丁氏家室遭毀，其與身幸免於難者，唯掌六公日夕披玩之「周易本義」一書而已。

當杭城失陷之際，各私家舊藏，多已散亡殆盡。丁氏恐斯文墜地，文獻無徵，因於城復之後，節衣縮食，苦心孤詣，竭盡所能，近訪遠求，收集文瀾閣書及諸家散出之善本，垂三十年之久。仁和孫岐氏在八千卷樓書目後一云：「於是棄車服之榮，樂瓊瑤之業，惡衣惡食，朝訪夕求。凡齊、楚、燕、趙、吳、越、秦、晉之間，聞有善本，輒郵筒往復，期必得而後已。內而秘殿所儲，外而島夷所著，力之能至，渺不徵求」。可見其蒐輯用力之勤，與訪求範圍之廣，誠為可敬。故袁昶撰丁君善舉廿八事碑云：「丁氏書多藏書，君蒐葺至四十萬卷，縑緞圖書甲一省，自天一閣、滄生堂、拜經樓、鑑止水齋、振綺堂，皆莫逮嘉惠堂牙籤錦障之富」，充分表達了對丁氏推崇之意。

丁丙於經營文瀾閣事畢後，念及家藏典籍，應有妥善藏儲之所，遂於光緒十四年冬，在杭州城頭髮巷故居正修堂之西北隅，闢地二畝，鳩工庀材，增築書樓，總其名為「嘉惠堂」，乃取於論旨「洵尼嘉惠士林」之嘆語，並藉志恩誼殊榮。俞樾撰丁君松生家傳云：「君先世本常藏書，君祖掌六公有八千卷樓。至君又益以二樓：曰後八千卷，曰小八千卷，然率較君所藏固不止三千八百也，君以天語有『嘉惠士林』之獎，因總名藏書之所曰『嘉惠堂』」。樓為五楹，其形式悉仿照四明范氏天一閣，其格局為：堂之上為八千卷樓；堂之後室五楹，額曰「其書滿家」，上為後八千卷樓；更後偏西為善本書室，上下三楹，其上即為小八千卷樓，唯廳事前院落均小。

各樓藏書內容為：「八千卷樓」正廳懸有「嘉惠堂」大字匾額為譚鍾麟手題，所貯為家藏四庫書錄之

書，有三千五百部，內有待補者百餘部，分排次第，悉依四庫簡明目錄，並以欽定圖書集成、欽定全唐文附於其後。樓之兩廂則存置四庫存目，及書出較後，未經採入四庫之書，共一千五百餘種。「後八千卷樓」有楊文登書區，藏置四庫所未收採之書，共得八千餘種，均以甲、乙、丙、丁做為分類標目，而制藝、釋義、遺書以及傳奇小說，悉附藏於此。「小八千卷樓」懸有「善本書室」錢樓題匾，所藏則為宋元刊本，約二百種，並擇取明刊精本、舊鈔佳本及著述稀本、校讎秘冊，合計約有二千種。計前後二樓，書樹凡一百六十，分類藏儲。以後歷年所得之書，皆依類編入。故丁氏藏書雖多，然部居整齊，排架有序，依類檢書，便利至極。此種完善管理，非其他藏書家所可擬，故孫樹禮撰善本書室記云：「所儲或宋元明刊本，或精鈔孤行本，或經某舊家珍藏，或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難更僕數，鉅與偉哉，洵吾杭之鉅觀矣。」

丁氏藏書最顯著之點，在旁搜博采，集腋成裘，並不專取一家，而能吸收前代著名藏書家之一、二，令人得以有窺一斑之機會。自明以來收藏家，如范氏欽天一閣、項氏篤壽萬卷堂、祁氏承煇澹生堂、毛氏晉汲古閣、錢氏謙益絳雲樓、曹氏澹靜樹堂、朱氏彝尊潛采堂、黃氏居中千頃堂、王氏士禎池北書庫、顧氏嗣立秀野草堂、錢氏晉述古堂、曹氏棟亭、趙氏昱小山堂、吳氏焯瓶花齋、孫氏宗濬壽松堂、王氏宗炎十萬卷樓、馬氏曰瑄小玲瓏山館、汪氏啓淑開萬樓、鮑氏廷博知不足齋、黃氏丕烈士禮居、吳氏霽拜經樓、袁氏廷禧五硯樓、何氏蝶隱園、許氏宗彥鑑止水齋、嚴氏元照芳椒堂、張氏金吾愛日精廬、陳氏揆稽瑞樓、馬氏漢濱晉齋、袁氏芳瑛臥雪廬、汪氏士鍾藝芸書舍、瞿氏紹基恬裕齋、勞氏格丹鉛精舍、郁氏松年宜稼堂、朱氏激結一廬、李氏之邨羅石室等家之收藏，有展轉流遂丁氏嘉惠堂，少或一、二種，多則有數十百部。檢核藏書志隨手可得其遞藏軌跡。書林清話卷九云：「赫寇亂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吳中二、三百年藏書之精華掃地盡矣。……江浙間所有善本名抄，又陸續會於湖州陸氏詒宋樓、仁和丁氏善本書室；長篇短冊，猶可旗鼓中原」。故其善本直接即為明清兩朝藏家之結晶。

世稱藏書之美，恒以宋元舊槧多寡為評鑑標準，而較為忽視影宋、影元、明清刻本，以及日本、高麗刻本；其實各種版本皆有其時代意義，在版本學史上所應具之地位，並無軒輊。故丁氏藏書宋槧只四十種、元刊選百種，較之百宋、千元，雖相去甚遠，然其藏書仍有可貴之處，約有數端：一、所藏多四庫修書底本，如李杞周易詳解、俞汝春春秋平義之類，可以考見當時修書之法制。藏書志卷一云：「此乃館中底本，上鈔翰林院印，改正點補，猶可見當時治書法制」。二、收藏多為名儒宿學所精寫校本，如厲鶚之東城雜記、武林石刻記等，藏書志卷十二云：「此為手稿本，塗乙審善，繕寫雅逸，其珍重又在宋槧元刊之外也」。又能重視鈔本，實之如宋本，甚至貴於宋元本，如藏書志卷一鈔本厚齋易學條云：「聚珍既未版行，鈔錄更屬罕見，兵災之後，巨帙完整，可作宋本觀也」。三、收藏明人著述特多。晁、陳所收僅止於南宋；丁氏時代最近，時去明末二百五十年，去明初則五百年，前人輕棄，不知其可。四、有日本、高麗刊本，可以略見異邦板本。卷四日本文政刊本孝經孔氏條云：「東瀛雕手，本號鬼工，蟲文註眼，傳華不遺，毫髮無殊，親睹卷也」。五、搜拾鄉先輩之叢殘，雖一卷半紙，亦必細備詳載。如吳廷華撰國禮疑義四十四卷條下，丁氏云：「亂後得殘本，留心三十年，重以鄉先生遺著，先記於冊，以待續訪存。」由於具備上述諸項特色，因而丁氏藏書之價值，仍能與宋元舊槧齊觀，並無愧色。

孰料光緒三十三年，丁氏子孫因經商失敗，虧耗巨萬，且負公債，官方責償，欲售所藏，日人多方覬覦，冀與詒宋樓之書，並歸三島。幸逢江蘇巡撫端方自歐考察歸來，盛贊西歐文明，擬積極創設圖書館；深知丁氏書關乎國粹前途，遂屬繆荃孫、陳慶年等，以七萬三千龍元代價，購其全部書藏，運歸金陵，置於葦山之龍蟠里，即江南圖書館，後改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丁仁八卷樓書目跋云：「宣統初，余家為鴟海，為司莞者不愼，負公帑至五萬之多，因舉所藏以歸江南圖書館，鄉黨惜之，然較諸詒宋之納諸東瀛岩崎文庫，猶覺此愈於彼也」。至於丁氏書紀錄曾遍查清實錄、清史、近世史事日誌、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及故宮清末檔案等文獻，皆未有所獲，而偶見「杭縣方志珍藏文物展覽特刊」，於精抄本李元賓文集之下載有丁鈞題辭，所述頗詳，其文云：「光緒丁未，江南圖書館以七萬三千龍元，盡購唐丁氏藏書，凡十八萬餘卷。時江督委余以典守編輯之任；因取丁氏舊藏書總目（原注：另抄本，非刊本之善本書目也。）相參校，則已多缺佚，心疑之，未敢言也。嗣乃知丁氏書裝箱運寧時，為其子弟所乾沒。」丁氏故物雖其後人不能善守，而能長留故國，惠施國人，仍屬楚弓楚得，較之陸氏詒宋舊藏樓運異域，則幸甚矣。

繆荃孫於所撰丁修甫（申之字）中書傳，即盛贊其售書之勇決與深明大義，其文云：「自遭家難，君拼擋所藏，悉遷公債，而不留絲毫，以備一已之需，固抗人之所共諒。至於書籍全歸江南圖書館，價雖稍貶，而書無少逸。易一地耳，書固可按目而稽。在江南，猶在丁氏，君需之熟、計之決，識者尤知其苦心矣」。

葉昌熾亦認為此舉可為私人藏書史生色，藏書紀事詩卷七云：「歸安陸氏詒宋樓精本，與守先閣所藏明以後刻本，日本以六萬金並金石拓本捆載而去。是時甸齋（端方之字）制府督兩江；聞丁氏書亦將散，

（下文轉第40頁）

必須對問題考慮得極其周詳，這是一般教育計劃所感不及之處。波費佛恰到處地說明其結果如下：

我們不停地強調電腦應用的目的應該詳加解釋，而且目前對於這種需要的強調還在增加之中。它和我們漸增的電腦經驗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十分有趣的關係。電腦與其他事物相比，以心算單純著稱。它需要極詳細的指令，所以我們應用它的時候不得不變得極為直言不諱。或許我們才氣縱橫，但不過只是笨笨的愚者而已；電腦很笨，但是十分腳踏實地，確實可靠。在電腦教學過程中，人與機器依然相依為用，無論我們學習是好是壞，似乎註定會變得比較精確一點。

(二)電腦的限制：大家公認電腦費用是非常嚴重的一大障礙。雖然如此，許多權威像金恩 (Karl Zinn) 却認為電腦的錯誤利用或是用之不當所發生的問題更加嚴重。例如英國的國家教育技術協會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England) 發表意見如下：

不要把電腦輔助教學當做僅含有電腦的學習過程。在這個系統內包括教師、印刷資料、及線型計劃教學資料等。電腦輔助教學的許多實驗發展未能充分發揮效果，是因為一般人企圖把全部教學過程都放到電腦裡去，而不是選擇其中可以應用的部分加以利用。

有些人認為電腦可以把一種非人性的特質加於教育計劃內。在歐丁格 (Anthony G. Oettinger) 及馬克斯 (Sema Marks) 的一篇有關教育技術革新的文章內，可以看出他們的意見：

假若所有電腦系統的個別化教學都是教導學生達到同一能力水準，儘管在型式上、速度上，或成績上稍有變動，這種教學目標也不能算是培養人性的教學。它就像是大

量的生產品，然後加上品質管制而已。多多少少好像讓學生趕緊到人家要他去的地方。

不過有些人反對這種看法，像霍茲曼 (Wayne Holtzman) 的：

有些事情的發展並不會像那批大驚小怪的人物所懷疑的那樣，毫無理由要我們相信這種新技術會讓學生失去人性。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物可以假藉機器去做，而且做得比人更好。將電腦應用於教育，可以讓學生以一種比以前更人性化的方式自由學習。

五、電腦新知資料

大家都知道電腦技術及其教育應用，正在發展之中，而且改變得很快。這種改變於未來的年代裏，料必有增無減。因此有志於教育的學生們更應該時時注意電腦的新發展及其對於教育的新應用。這方面的資料可以參考下列各個協會的出版品——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AEC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Data Systems (AEDS);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及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FIP)。

此外，金恩的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n Interactive Use of Computers for Instruction，這本書也相當不錯，不斷有修訂本出版，內容十分新穎。書中並有各種書目、計劃報告、會議資料及電腦應用於教育的最新發展。(待續)

(上文接第35頁)

懼其為平原之續，垂囑繆筱珊前輩，至武林訪之，盡輩白下，開設書館，以惠學者。兩家之書，同一不能守，而松存身後，不至流入海舶；視存齋為幸矣，亦匄公之力也」。柳詒徵先生云：清光緒中，海內數收藏之富，稱望、楊、丁、陸四大家，然丁氏于文化史上之價值，實遠過望、楊、陸三大家，丁氏義舉，誠值得國人深為贊許。

三、藏書印記

丁氏藏書印記，累累數十，常見者如下：

- 「善本書室」(朱文方印) 「漢晉唐齋」(白文長方) 「濟陽文府」(朱文長方) 「甘泉藏書」(朱文方印) 「八千卷樓」(朱文方印) 「八千卷樓所藏」(朱文長方) 「八千卷樓藏閱書」(朱文方印) 「八千卷樓藏書印」(朱文方印) 「八千卷樓藏書之記」(朱文方印) 「八千卷樓丁氏藏書印」(白文朱方) 「八千卷樓收藏書籍」(朱文方印) 「曾藏八千卷樓」(白文朱方) 「曾經八千卷樓所得」(朱文方印) 「嘉惠藝林」(朱文長方) 「嘉惠堂藏閱書」(朱文長方) 「嘉惠堂丁氏藏」(朱文扁方) 「嘉惠堂丁氏藏書」(朱文長印) 「錢澹丁氏藏書」(白文朱方) 「錢澹丁氏正修堂藏書」(朱文方印) 「泉唐丁氏竹舟申松生丙辛酉以後所得」(朱文長方) 「泉唐嘉惠堂丁氏藏善本書圖記」(朱文長方) 「丁居士」(白文朱方) 「書庫抱殘生」(白文長方)

又據「兩浙藏書家印章考」云，丁氏藏書印記尚有：

- 「光緒辛巳所得」 「松生」 「小定威」 「竹書堂」 「求己室」 「風木庵」 「四庫著錄」 「四庫附存」 「東門榮錄」 「辛酉初後所得」 「八千卷樓藏書記」 「後八千卷樓」 「錢澹丁丙校讀」 「嘉惠堂藏書之記」 「嘉惠堂丁氏藏書之印」 「嘉惠堂丁氏藏書之記」 「光緒庚寅嘉惠堂所得」 「光緒壬辰錢澹丁氏嘉惠堂所得」 「光緒壬午年嘉惠堂丁氏所得」 「光緒癸巳泉唐嘉惠堂丁氏所得」

(待續)